

语言规划的动机分析

刘海涛

(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系, 北京 100024)

摘要: 丹尼斯·阿格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动机研究》一书中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七大动机身份、意识形态、形象、不安、不平等、融合、工具等进行了充分阐释。阿格的论述说明: 语言规划的动机不是单一的, 而是一个复杂的, 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多维结构。

关键词: 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 动机, 身份认同, 语言形象, 语言平等

语言规划是人类对语言发展进行有意识的干涉的行为。有关语言规划的定义, 有很多, 可以说是众说纷纭。^[1]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语言规划有不同的诠释。如果我们不纠缠于语言规划不同定义的具体细节, 那么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语言是可以计划的;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 人的参与是必要的; 语言规划行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如此, 那么深藏在语言规划后面的动机是什么? 换言之, 为什么人类要对语言的自然发展进行干预? 通过对这些动机的深入分析, 我们不但能更清楚地认识语言和社会的关系, 人与语言发展的关系, 也有益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本文是对丹尼斯·阿格(Dennis Ager)的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动机研究) 一书的简单介绍和阅读时的一些想法, 不当之处, 请大家指正。

在“引论”一节, 阿格引入的“语言行为”概念值得注意, 因为随后的许多讨论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所谓“语言行为”就是人们在使用语言过程中的行为, 以及人们对于他人使用语言或交际系统本身所采取的行动。为了更好地研究语言规划及语言政策的动因问题, 阿格提出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语言作为对象”的两种语言观。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 因为, 如果我们想要细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机理和动因, 那么, 对于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语言规划过程中的作用难免就要区别对待。这两种语言观的分立, 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主体在语言规划进程中的作用提供了可能。如果我们将“语言行为”和这两种观点联系起来, 就会发现在自身语言使用行为中, 语言是被视为一种工具的; 而在针对他人语言使用的行为中, 语言就成了一种对象。在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献中, 人们一般只研究“语言行为”中的第二种, 即如何影响他人的语言活动, 而且行为的主体一般也仅限于国家机构或政府部门, 为此就致使很多时候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别。由于本书的标题中同时含有这两个术语, 所以, 阿格为了方便讨论, 用“规划”表示那些由个人或集体从事的非官方的活动, 用“政策”特指官方的行为。在众多语言规划的定义中, 阿格赞同 Cooper (1989) 一书中提出的语言规划行为分析模式, 即语言规划活动的 8 要素: 谁是规划的制定者? 针对什么行为, 针对哪些人? 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 在什么条件下? 用什么方式? 通过何种决策手段? 效果如何?^[2]如果我们对这 8 个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 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语言规划的行为都可以在这 8 维空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介绍阿格的这本书, 主要分析这 8 个因素中的 ends, 即语言规划的“动机”, 也有学者称其为“目标”、“目的”。

阿格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活动的动机分为以下 7 类: identity (身份或认同), ideology

(意识形态), image (形象), insecurity (不安), inequality (不平等), integration (融合) 和 instrumental (工具)。除此之外, 阿格认为除了这 7 个 I 之外, 还应该增加以下两个因素: 决策者或政策制定者对于某种语言的态度 (attitudes) 以及他们想通过这些活动所达到的具体目标 (goals)。

(国家身份) 认同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区别于其它民族或国家的根本属性, 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身份证。一般认为, 语言和宗教是一个民族的象征, 换言之, 当一个民族和国家试图发展自己的区别性特征时, 语言往往成为其首选。下面 5 个案例较好地说明了解决“身份问题”是语言规划活动的一个主要动机:

(1) 领土完整: 法语及法国内部的地区性语言 (1539-1950)。纵观法国这 400 年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在实现法国提倡的民族身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法国的这种民族国家理念: 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方领土、一种政治概念, 也为许多其它的国家树立了榜样。如果联系法国政府在种种国际场合的做法,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法国人如此热爱自己语言的深层原因了。

(2) 民族主义的抵抗: 经典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应用 (1962-1990)。法国人对于法语的热爱, 不仅仅局限于在国内强行实现一种语言的政策, 而且在它的殖民地和海外属地, 也是大力推广法语, 打压当地语言。这当然会带来当地人民的不满。比如, 在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大力推行法语, 即便在今天, 阿尔及利亚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法语国家, 讲法语的人数仅次于法国本土。1962 年, 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 次年, 阿尔及利亚宪法规定经典阿拉伯语是国家惟一的官方语言。但不幸的是, 由于在法国统治期间, 经典阿拉伯语被视为一种外语, 从 1938 年起, 在国内便不再有人使用了。为了依宪法行事, 人们不得不从埃及引进大量懂这种语言的人才来担任政府工作人员和教师, 这又导致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的失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为了实现法兰西提倡的民族国家的理念, 阿尔及利亚抛弃了法语, 否决了自己的阿拉伯语变体, 采用了一种完全只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这种不顾语言使用实际状况的行为, 忽视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现状而极力追求语言“身份”的做法, 导致了靠外国人来支持国家运作的奇怪现象。

(3) 区域自治: 加泰罗语 (1978-1998)。加泰罗尼亚作为西班牙的一个地区, 一直是语言规划研究者和语言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一个地区。这是因为它是一个身兼“多数中的少数”和“少数中的多数”的典型代表, 加之语言又是加泰罗尼亚政治家们提倡自治和独立的重要因素。加泰罗尼亚的故事仍在延续, 但下面这些事实是否是延续的真正理由呢? 就人口而言, 约有 1000 万使用人口的加泰罗语是欧洲的第 19 大语言。加泰罗语是其领地内的主要语言,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少数中的多数”的意思。加泰罗尼亚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 收入水平较高。加泰罗语具有灿烂悠久的历史。这种语言的使用者遍及各个阶层, 并且特别受到中产阶级的宠爱。从语言学的角度看, 加泰罗语的标准化程度较高, 几乎没有方言变体。也许据此我们可以理出一个普适的基于语言的自治运动模式? 或许这也就是加泰罗吸引语言政策研究者的理由?

(4) 需求的力量: 印度的语言政策。印度有 1625 种语言, 其中的 33 种的使用人数超过百万。为此, 任何语言规划和政策的研究者没有理由忽略这个有趣的国家。一般认为, 尽管历史上印度不乏由于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纷争, 但今天的印度有一个世界上涉及人口最多的、民主的语言政策, 这一政策基本得到了国内各民族的认同。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的呢? 众所周知, 印度有多种官方语言, 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可行。为了解决实际交流问题, 满足交际的需要, 印度人对其前殖民者的语言 (英语) 采用了与阿尔及利亚人完全不同的做法, 即: 将英语作为超民族的、事实上的国家共同语。这样做, 一方面保证了各语言在法律上的平等性,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英语对印度各民族而言的中立性, 是一种“不得已”的实用主义的语言政策, 是一种需求和现实结合的产物。鉴于今天的印度英语从各个层面都有别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3], 所以, 印度的国家“身份”, 在一定的程度上, 甚至是用一种非印度本土语言来体现的。

印度人已经接受了这种 3±1 的语言模式，也就是说每一个想过得好一点的印度人应该掌握 2-4 种语言。我们认为，从国际语学的观点看，印度的解决方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他们实际采用的是一种中立的、基于英语的自然型“计划语言”。虽然这种语言与英语的差别不难看出，但仍然可以互通互解。印度英语和英美英语之间的差别，可以与 Ogden 的 Basic English 和标准英语的差别相提并论吗？这同样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5) 政治、文化和经济：威尔士的语言法令（1993）。这里所说的威尔士语言法令只是相关民族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于语言权利的一种要求，但是它反映了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这从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语言权和语言多样性正在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威尔士经验对于语言政策的启示可能有 3 点：有助于政策的制定者对于少数民族独立性的认识；民族独立性是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固然重要，但经济因素是重中之重，没有满意的经济条件做支撑，所谓的独立的追求如同白日做梦；身在其中的广大人民，必须在“身份认同”运动中得到实惠，否则语言政策只能是一种象征，是一种知识分子手中的玩物。

通过这 5 个例子，人们不难看到，语言确实是民族或国家寻求其自身“身份”的一种手段，也是民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题为“ideology”（意识形态）的这一章里，阿格通过描述英国人对于标准英语的做法，特别是标准英语在教育体系中地位的变迁，勾画出了一幅意识形态因素是如何对语言政策产生影响的图景。一般而言，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执政者对于语言的看法，是一种上层建筑对于语言发展的参与和干涉。

语言不但是构成民族和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一个世人都想学的语言，其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支撑。换言之，从一种语言的流行普及程度，我们可以马上就推导出它身后国家的实力。为此，许多国家不惜重金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推广自己的语言。当然，这不包括英语，因为今天的英语已经是英美等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了。第 3 章“形象”说的就是这一方面的事情。这一章列举的事例有德语的海外推广、日语出口、欧洲语言政策等。通过德、日的例子，我们似乎感到一种语言的流行，其决定因素是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等因素掺杂在一起，构成一种人们很难再现的推动力量。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语言的发展呢？在一种语言规划行为的成果里，有哪些是人直接干涉的结果呢？这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关于欧洲的语言政策^[4]，同样也是语言政策的研究者们很感兴趣的题目，Phillipson 有更详细的描述和改善目前状况的理性建议^[5]，可参考。阿格关于欧洲语言政策的几句话值得介绍一下。他认为欧盟语言形象是极力维持语言的多样性，这无疑是对的，因为欧盟的实践和许多法律性文件，证明了这一点。接下来，他又说，如果要采用单一共同语言的政策，而这种语言又不是英语的话，注定会失败。阿格将此原因归结于法国的反对，但事实可能并非这么简单。采用英语，在许多方面是和欧盟“语言多样性”的形象相违的，也是对于大多数欧盟人民语言权的不尊重。阿格可能也感到这个问题不是如此简单，于是反问自己：如何在保留欧洲文化的前提下，有效地解决共同语问题呢？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多次提到的全球化场景下，如何在保证语言多样性和语言权的前提下，达到有效的语言沟通，这不仅仅是对学者和政治家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6]

本质上讲，“Image 形象”是“Identity 身份”的外在反映，既然语言对于“身份”的确定有极大的作用，有时甚至就是身份，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对于“形象”的塑造是如此重要，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国家级的“形象工程”和语言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了。

所谓“Insecurity—不安”指的是自己的语言在受到外来威胁时，人们的一种心理反应。将这种心理的反应落实到具体的保卫语言的行动上，这就有了本书第 4 章介绍的一些例子。吉普赛人的流浪故事，相信我们从电影里已经看到了不少。本章所举吉普赛人在中欧的现状，让我们感

受到的是辛酸，而非浪漫。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分立，使得许多吉普赛人没有了归属，而这其中语言又扮演了它该扮演的角色。法国人对于从英语引进新词新语的抵抗，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法国人对于自己语言和文化的热爱，有的人可能会嘲笑法国人对此的恐惧和不安。英语的入侵，是否会像法国人担忧的那样，毁灭法兰西文化，毁灭法国的生活方式，毁灭法国的学术体系，最后彻底毁掉整个法国，我们不知道，但是，法国人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也许，下一个轮到的就是我们自己。为了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首先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感到“不安”和“危机”，然后制定行动方案，保卫自己的语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语言多样性”和“语言人权”的研究和行动越来越热，其深层原因也许就是“不安”和“危机”在起作用？

一般来说，“不平等”和“不公正”是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而言的。也就是说，“不平等”是遭受到这种待遇的人们的一种体验。既然如此，这种不平等很少能通过正常的语言规划行为来得到校正。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例外，如政策的制定者出于某种其它的目的，或者是良心发现而采取的行动，或者是过去的受害者有朝一日大权在握，诸如此类毕竟少见。在这一章里，阿格为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性别”（美国女权主义）、“欧洲关于区域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宪章”、“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3个案例。似乎给我们的感觉是，弱势群体对于自己语言遭受的“不平等”要么忍受，要么等待当局者良心发现，要么行动起来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感受到阿格对此问题解决的悲观和失望，可能情况原本就是如此。例如，阿格认为欧洲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宪章，也就是说说而已，是一种纸上谈兵的东西。对于广为赞扬的澳洲国家语言政策^[7]，其动机是否就是当局者所说的为了改变语言交流中不平等和不公正，阿格也表示怀疑。我们不否认阿格列举的制定该政策的3个理由：认可移民、统一语言和促进经济，但是我们也愿意相信，时任澳大利亚教育部长的 Susan Ryan 在 *Lo Bianco* 一书的前言里，几句短短的话语中透出的真情实意。语言政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本节我们又一次认识到“表里不一”的普遍存在，许多国家一方面要求其它国家保护自己的语言在他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又打压别的少数民族语言。也许这世上就没有旨在消灭“不平等”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因为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本质就是限制人们语言行为的条条框框。

以上这些动机，基本只适用于从上至下（top-down）语言政策的实施和制定，也就是将语言视为一种对象的语言规划行为。在题为“融合和工具”的第6章里，阿格将注意力转向了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从政治、社会等因素来观察语言规划问题，对于个人的语言规划行为也进行了分析，换言之，这一部分的内容不但涉及语言作为一种对象，也牵涉到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的语言规划行为。按照阿格的观点，个人语言行为一般都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对于许多人来说语言就是一种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工具。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阿格列举了美国移民的归化问题、非洲的共同交际语问题以及5个具体的语言学习例子。从非洲集市交易的语言问题，阿格得出：英语作为一种国际交往的语言，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学者们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语言权利的研究之上，而忽视了交流的实际需要；在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得到快速发展的背后，没有什么有意识的行为，完全是自由发展和历史原因造成的结果。对此我们不敢苟同，英语今天的地位，是否英美等国有意为之，可参看相关文献^[6]。我们说一个人有权选择和放弃某种语言的使用，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绝对没有权利这样做。换言之，个人用自己的母语来换取生活的享受，我们没有必要对其过于责备，但是一个民族采用同样的方法，则有可能换来民族的消亡。作为一个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研究者而言，认清个人实用主义和受利益驱动的语言获得动机，会更有利于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我们基本赞同阿格在本章结尾所说的：“这些案例中涉及的所有动机都是为了寻求一个更佳环境与人的适应性。显然，语言行为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漫无目标的”。^{[8]124}这也许就是“适者生存”在语言政策领域的体现。

在第7、第8两章，阿格将前面引入的7个I，加上语言态度的4个因素和具体目标，形成

了一个较完整的分析语言行为的网络，并且将本书所举的例子一一嵌入，从而验证了这一框架的适用性。以下是框架的基本结构：

动机名称	态度因素构成								理想和目标
	优劣性		生命力		吸引力		参与度		
	L1	L2	L1	L2	L1	L2	L1	L2	
身份（个人）									
身份（社会）									
意识形态									
形象									
不安									
维护身份（独立性）									
保卫身份（独立性）									
维持不平等									
消除不平等									
融合									
改善工具									
彻底绝望									

填表分析时，首先选择动机栏，然后在4个相应的态度因素里填写1, 2, 3三个数字，来表示各因素的强度。L1表示语言1，一般指相关的母语，L2表示语言规划活动中涉及的第二种语言。

本书用翔实的事实告诉我们语言规划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心理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多维结构。这种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动机量化的做法，非常有利于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虽然阿格在书中多次提到语言交际的重要性，并且在许多动机里提到了交际，但是没有单独将交际列为一种动机，我们认为这是本书的一个不足。因为语言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研究如何提高语言交际效率的领域。事实上，许多东方国家的语言规划实践已经证明了提高语言交际效率也是人们进行语言规划的一种动机。

本书用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它也是文化的容器和身份的象征。语言的这3种功能要求不同的语言政策来保证，这就要求语言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不得不均衡考虑各个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解决交际问题不是语言规划的惟一目标和任务。这样，仅把语言规划区分为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可能就不够了。Kaplan/Baldauf (2003)又提出了语言教育规划和声望规划^[9]，虽然语言教育规划可视为Cooper(1989)中提出的习得规划，但Kaplan/Baldauf对于语言规划类型的细分基本可以满足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出于不同目的（动机）而进行的语言规划活动。在这个框架里，地位规划针对的是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本体规划是面向语言本体的行为，语言教育规划是关于语言学习的，而声望规划的实质就是语言的形象工程。

总的说来，语言规划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杂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多维结构。对于语言规划的研究者而言，进行这样跨越多种学科的研究无疑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如果没人这样去做，则可能对于学科本身的发展更不利。^{[10]3}

参考文献

- [1] 刘海涛.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 [M] //陈章太主编. 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55-60.
- [2] Cooper, 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98.
- [3] Dasgupta, P. *The otherness of English*. India's auntie tongue syndrome. New Dehl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 [4] 刘海涛. 欧洲联盟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 [M]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 (上编), 商务印书馆, 2006:374-389.
- [5] Phillipson, R.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6] 刘海涛. 国际语言交流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M]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编. 2005 学术前沿论丛.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302-330.
- [7] Lo Bianco, J. *The 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87.
- [8] Ager, D.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124.
- [9] Kaplan, R. and Richard B. Baldauf Jr. *Language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the Pacific Basin*. Dordrecht/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 [1 0] Wright, S.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from nationalism to globalis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3.

Analysis of motivation of Language Planning

Liu Haitao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After evaluating seven motivations of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dentity, ideology, image, insecurity, inequality, integration and instrumental proposed by D. Ager in the book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otivation of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s not single, it is a complex with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Keywords: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policy, motivation, identity, ideology, image, equality

作者简介: 刘海涛(1962-), 男, 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系教授, 博士。研究领域: 应用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 依存和配价理论,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国际语语言学。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 荷兰 John Benjamins 出版社) 等三本国际性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